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 主编

中德文化关系评论集

SCHRIFTEN ZU DEN
CHINESISCH-DEUTSCHEN
KULTURELLEN BEZIEHUNGEN

叶隽 著

中德文化丛书 叶隽 主编

中德文化关系评论集

SCHRIFTEN ZU DEN
CHINESISCH-DEUTSCHEN
KULTURELLEN BEZIEHUNGEN

叶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德文化关系评论集 / 叶隽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中德文化丛书)

ISBN 978-7-5446-0866-4

I. 中… II. 叶… III. 文化交流—中国、德国—文集

IV. G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338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lep.com.cn> <http://www.slep.com>

责任编辑: 张亚东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89×1240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3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 第 1 版 2008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0866-4 / H · 0373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中德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
陈洪捷 北京大学
范捷平 浙江大学
李明辉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
麦劲生 中国香港浸会大学
孙立新 中国海洋大学
孙周兴 同济大学
卫茂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武能 四川大学
叶 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国刚 清华大学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Adrian Hsia 夏瑞春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Françoise Kreissler 何弗兹 法国东方语言学院
Iwo Amelung 阿梅龙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Joël Thoraval 杜瑞乐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Klaus Mühlhahn 余凯思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Michael Lackner 郎密榭 德国埃尔郎根大学



中德文化丛书

总序

一、中、德两国在东、西方(亚欧)文化格局里的地位

华夏传统,源远流长,浩荡奔涌于历史海洋;德国文化,异军突起,慨然跃升于思想殿堂。作为西方文化、亦是欧陆南北对峙格局之重要代表的德国,其日耳曼统绪与位于亚洲南部的印度文化颇多血脉关联,而与华夏文明恰成一种“异体”态势,这可谓“相反相成”之趣味。

作为欧陆南方拉丁文化代表之法国,恰与中国同类,故陈寅恪先生谓:“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诚哉是言,在西方各民族文化中,法国人的传统、风俗与习惯确实与中国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然也不排除文化间交流的相互契合:诸如对科举制的吸纳、启蒙时代诸子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接受等皆是。如此立论,并非敢淡漠东西文化的基本差别,这毕竟仍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分野;可无论是“异于中国”,还是“趋于中国”,均见钱钟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

在亚洲文化(东方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中国文化属于北方文化,印度文化才是南方文化。中印文化的交流史,实际上有些类似于德法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属于地缘关系的亚洲陆地上的密切交流,构成了东方文化的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由于地域太过辽阔,亚洲意义的南北文化交流有时并不能相对频繁地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态势。因为,两种

具有互补性的主导性文化，往往能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可能是一个基本规律。

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欧洲三强英、法、德各有所长，可若论地缘意义上对异文化的汲取，德国可拔得头筹。有统计资料表明，在将外语文献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国居首。其中对法国文化的吸收更成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乃至一口流利法文的歌德那一代人，因“过犹不及”而不得不激烈反抗法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无论正反事例，都足证德意志民族“海纳百川”的学习情怀。就东方而言，中国因为在地理上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故能得地利之便，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汲取，不仅是一种开阔大度的放眼拿来，更兼备一种善择化用的创造气魄，一方面是佛教在印度终告没落，另一方面却是禅宗文化在中国勃然而起。就东方文化之代表而言，或许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

中德文化关系史的意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全局眼光中才能特别凸显出来。即这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而非仅一般意义上的“双边文化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主导性的文化间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二、作为文明进程推动器的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的“超人三变”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这一论断，也早已为第一流的知识精英所认知，譬如歌德、席勒那代人，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汲取不同资源的重要性，而中国文化正是在那种背景下进入了他们的宏阔视阈。当然，我们要意识到的是，对作为现代世界文明史巅峰的德国古典时代而言，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要，但作为主流的外来资源汲取，是应在一种宏阔的侨易学视阈（此概念作者将专文论述，此处不赘述）中去考察的，这一点歌德总结得很清楚：“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

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此处涉及文化交流的规律性问题，即如何突出作为接受主体的主动选择性，若按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照示者也。”这不仅是 中国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外来资源，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总体而言，德国古典时代对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汲取与转化创造，是一次文化交流的质的提升。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意义在此。

至于其他方面的双边交流史，也同样重要。德印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德国学者涉猎较多且深，尤其是其梵学研究，独步学林，赫然成为世界显学，正与其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相吻合。而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第一流学者，如陈寅恪、季羨林等就先后负笈留德，所治正是梵学，亦可略相印证。中法文化交流史同样内容极为精彩，由启蒙时代法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借鉴到现代中国发起浩浩荡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转易为师的过程同样值得深入探究。总之，德、法、中、印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应当归入“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之列。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问题本身。必须加以区分的是所谓“古代中国”、“中世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概念分野。前者相当于传统中国的概念，即文化交流与渗透尚未到极端的地步，尤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核心；“中世中国”则因与印度佛教文化接触，而使传统文化受到一种大刺激而有“易”，禅宗文化与宋儒理学值得特别关注；“现代中国”以基督教之涌入为代表、西学东渐为标志，仍在进程之中，乃是以汲取西学为主的广求知识于世界，可以“新儒家”之生成为关注点。经历三变的中国，“内在于中国”为第一变，“内在于东方”为第二变，“内在于世界”为第三变，三变后的中国，才是具有悠久传统而兼容世界文化之长的代表性文化体系。

先秦儒家、宋儒理学、新儒家思想（广义概念）的三段式过渡，乃是中国思想渐成系统与创新的标志，虽然后者尚未定论，但应是相当长时期

内中国思想的努力方向。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代表性且兼具异质性的交流,在数量众多的双边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不俗的意义。张君勱在谈到现代中国的那代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有这样的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这其中固然有个体面对知识海洋的困惑,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输入与择取外来思想的困境与机遇。王韬曾感慨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不仅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思想方面亦然。而当西方各强国纷纷涌入中国,使得“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合并东向之际,作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教育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学术,则自有其非同一般的思想史意义。实际上,这从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史历程也可看出,19世纪后期逐渐兴起的三大国——俄、日、美,都是以德为师的。

故此,第一流的中国精英多半都已意识到学习德国的重要性。无论是蔡元培强调“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还是马君武认为“德国文化为世界冠”,都直接表明了此点。至于鲁迅、郭沫若乃至蒋介石等都有未曾实现的“留德梦”,也均可为证。中德文化研究的意义,端在于此,而并非仅仅是众多“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一个而已。如果再考虑到这两种文化是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方文化之个体(民族—国家文化),那么其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三、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关联背景下理解中德文化关系的意义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划地自牢”,因为只有将视阈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体联动视域中,才能真正揭示规律性之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谈中国文化的西传,更要考察波斯—阿拉伯、印度、日本文化如何进入欧洲(西方)。这样的东学,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东学。当东学西渐的轨迹,经由这样的文化交流史梳理而逐渐显出清晰的脉络时,中国文化在这样一种比较格局中,才会更清晰地彰显其思想史的意义。这样的工作,需要学界各领域研究者的通力合作。

而当西学东渐在中国语境里具体落实到 20 世纪前期这辈人时，他们的学术意识和文化敏感让人感动。其中尤其可圈可点的，则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德学会的沉潜工作，其标志是“中德文化丛书”的推出，这其中不仅有《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这样的系统翻译工程，也包括《中德学志》等刊物的学术功用……至今检点前贤的来时路，翻阅他们留下的薄薄册页，似乎就能感受到他们逝去而永不寂寞的心灵。昔贤筚路蓝缕的努力，必将为后人开启接续盛业的来路。光阴荏苒，竟然轮到了我们这代人。虽然学养有限、社会功利，但对前贤的效慕景仰之心，却无有或减。如何以一种更加平稳踏实的心态，继承前人未竟之业，开辟后世纯正学统，或许就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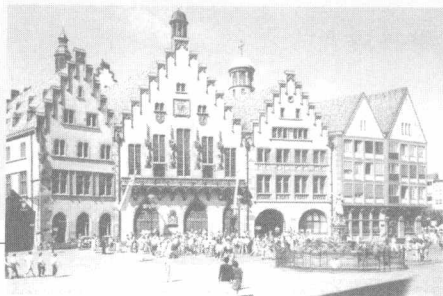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仍要说我们很幸运，当冯至、陈铨那代人不得不因为民族战争的背景而辗转颠沛于流离战火中时，一代人的事业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宣告中断”时，我们却还有可能静坐于书斋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大潮喧嚣得似也要推翻学院里“平静的书桌”，但毕竟书生还有可以选择的权利。在清苦中快乐、在寂寞中读书、在孤独中思考，这或许已是时代赠与我们的最大财富。

所幸，在这样的市场大潮下，能有出版人（外教社）的鼎力支持，使这套“中德文化丛书”得以推出。我们不追求一时轰轰烈烈吸引眼球的效应，而希望能持之以恒、默默行路，对中国学术与文化的长期积淀略有贡献。在内容上，丛书将不拘一格，既要推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著述，亦要译介国外优秀的学术著作；就范围而言，文学、历史、哲学固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教育、思想亦是重要背景因素，至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内容，也都在“兼容并包”之列；就文体而言，论著固所必备，随笔亦所欢迎；至于编撰旧文献、译介外文书、搜集新资料，更是我们当学习德国学者努力推进的方向。总之，希望能“水滴石穿”、“积跬步以致千里”，经由长期不懈的努力，将此丛书建成一个略具规模、裨益界的双边文化之库藏。

叶隽

2007 年 4 月 27 日至 12 月 22 日间

陆续作于巴黎—布达佩斯—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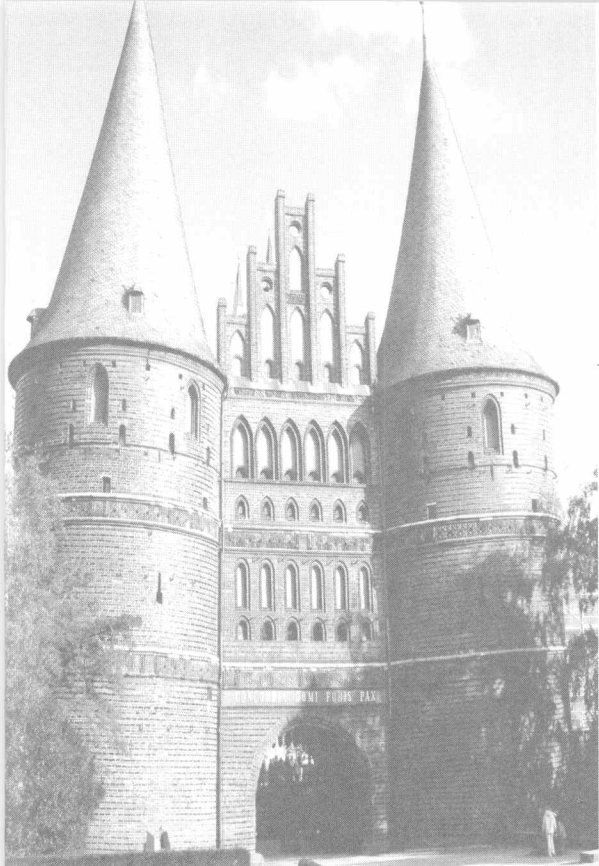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辑 德风东渐(中德文化关系研究著作书评)

“德风东渐”与“筑渠引水”	3
一种生成:文化互动与文化积累	8
1920年前后中德两国的四部畅销书	13
“拓荒之作”与“同情理解”	20
——读韩尼胥的《1860—1945年中国留德学生的历史 and 影响》	
历史如何展向当代、流往未来?	25
——读《中国人留学德国教育》	
国别文学汉译史的意义	31
——读《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	
中德学术关系之建构	35
——读《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在学术史、文学史双重视角中求解	41
——读《中国文学在德国》	
德国文学里的中国图景及其思想史意义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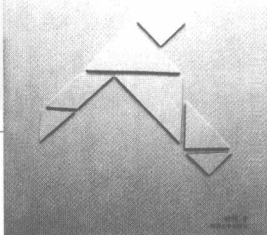
花自飘零风尘中	53
——念杨丙辰先生	
清风送爽到天涯	61
——念作为北大师长的欧尔克先生	
先生百龄,乘风而去	69
——送张威廉先生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	75
——关于张威廉先生的历史记忆	
出入高下穷烟霏	82
——追念商承祖先生	
先生书生,百年知命	88
——20 世纪 50 年代的冯至先生	
冯至先生的德国文学史观	95
作为文学史家的冯至与王瑶	101
旁逸横出,筚路蓝缕	109
——念刘大杰先生	
凤去台空江自流	115
——追念李长之先生	
江流风去人犹在	121
——读李长之先生的两部小书	
江山诗人情	127
——作为德语文学研究者的陈铨	
后 记	134



第一辑

德风东渐

『中德文化关系研究著作书评』



“德风东渐”与“筑渠引水”

作为一个有相当影响的西方大国，“德国”之成为一个课题，自然不在话下。而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德国的经济腾飞与政治崛起，德国思想文化之进入现代中国，亦同样是学术史上值得深究的命题。“德风东渐”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发生、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考察德国资源之形成与作用，已有专文论述。这里要谈的是，作为一种特殊国别思想文化资源的“德国资源”，怎样才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选择与输入的具体技术层面，究竟有哪些历史经验可以总结？

在我看来，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立场思想的区别，即仅有单纯意义上的客观的“德风东渐”可不行，我们更需要具备主观能动性的“筑渠引水”。外来资源是“水”，虽然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说源头之水是重要的；但源重要，并非就是说“渠”不重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渠”更是具有关键性的因素。那么“渠”是什么呢？大渠是现代中国的整体语境，小渠是中国的德国学研究与传播场域。而由源头通向大渠的过程，则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

赖小渠的构筑与畅通程度。

打个比方说,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从传教士到留学生”,既体现了西学东渐历程中最重要的传播主体的变迁,也是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外来资源”体现方式。但传教士东向布道送来的“资源”,与留学生西去求法取回的“资源”,却大有区分。其中所包含的西方科技与文化,“基督福音”与“国家利益”,乃至“中国语境”等诸方面复杂因素,交相影响,如何协调其间张力并产生文化史意义,值得特别关注。如果说,在“现代中国”的发生期,因了“救亡”与“启蒙”的种种因素,使我们最优秀的知识人都不可能从容地养成自我平静心态、善于择要和理性行动的话,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毕竟不能简单地重复历史,如何审思明辨、总结经验、超越前贤,乃是不得不常萦于怀的题中应有之义。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它的输入与本土接受、转化、提升,都有一个延续性的过程,在时间上不会“一蹴而就”,在效果上也不可能求其“立竿见影”。而在这一过程中,过滤器装置的若干“环节”因素则至关重要。这连接源头与大渠的“小渠”,则既是必要的一段管道,同时又必须具备“过滤器”的功能。这一待筑的小渠,正是我们的译介、评论与研究之孔道。“西学东渐”,乃是现代中国的重要背景,其实不仅是泛泛之“西学”需要深入讨论、细加区分,就是“西学”之外,也有“东学”与其他“外国学”值得特别关注。而在我,则强调关注“西学”本身的复杂性,即需要仔细区别诸重要国别资源的差异与特色,诸如德、法、英、美等。近代以来,德国资源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独标一格,留德学人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处不赘。(参见叶隽《西学东渐视野中的“德国资源”与留德学人》,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16日)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推出的有关德国思想文化的“丛书”,就颇是可圈可点:早期的如三联的“德国文化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德国哲学与文化丛书”;近期的如“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同济大学出版社),都有这样的功能。当然,与美国学、日本学的渐成显学相比,“德国学”似尚未得到与之相应的地位,不过,存在即为合理,位置是争取来的。与蔚为潮流的美国学、日本学相比,德国学确实值得特别关注。之所以如此立论,并非是看到德国人勃勃崛起的雄心与可能,诸如谋求中国支持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类;更看重的,是德国先哲所留下的不逊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灿烂文明与博大哲思。康德、

歌德、席勒、费希特、洪堡、贝多芬与黑格尔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重塑古典辉煌的时代，更是人类文明的巅峰时刻；不要说叔本华与尼采、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是兰克、冯特、韦伯、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黑塞、曼氏兄弟，他们所展现的德国学术文化场域的如丝缕，都意味着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惠益于世界与后人。作为文明世界的后来者与异族人，我们有必要追问，如何选择自身的命运？如何面对思想的遗产？（参见邓晓芒、肖自强：《关于中国西学体制的对话》，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5期）问题凝聚为，我们如何“筑渠引水”？说来容易，付诸实践，可真的没有那般轻巧。

但就目前情况来说，国人似乎对此问题仍缺乏必要的重视。西学在日本的传播过程，颇值得借鉴。早期的西学，日本称为“洋学”，有一个从“兰学”过渡而来的过程，之所以命名为兰学，是因为西学主要是通过荷兰传入日本的。初期，兰学主要是翻译荷兰的语言学和西方的医学；稍后，兰学研究扩展到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再后，发展到军事技术乃至西方的哲学、政治学说等。到这个阶段，“兰学”就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的内容了，“洋学”的发展已成为必然，不但民间开办学塾传授洋学，就连幕府也要设立洋学研究机构。在这个基础上，洋学的内容进一步扩展为具体的专门国别学术的研究，即英国学、法国学、德国学等。（参见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第83—84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而其中，德国学对于现代日本的形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曾留学日本的中国学人亦感同身受，因为在当时，“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第5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之所以能形成磅礴于学术界、知识界乃至社会层面的影响，与日本人“有我选择”与“筑渠引水”的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当然也有论者认为日本是“学德国步入歧途”，“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参见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北京，第76—77页）这一问题值得细加讨论，但这里要强调的是，无论如何，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使西方各门科学能够按照其原有的逻辑关系全面地移植进来，并且有计划地、稳定地持续发展下去”，而这种发展使得日本“原有的知识结构”得到很大改变，“爆发出巨大的知识能量”，于是乎迅速完成其

近代化过程，“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鲁军《清末西学输入及其历史教训》，载丁守和、方行主编《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辑第122—123页）这与他们在学术文化层面的“筑渠引水”意识是不可分割的。这种意识，现代中国的知识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具备，且能够身体力行呢？这种意识，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市场化、全球化多重压力下的当代中国知识人来说，又有多少能有暇虑及并沉默行动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的出现，体现出筑渠理念与勇于实践的良好结合。该套丛书著译兼收，强调对鲁迅先生理想的坚持，即“模仿”与“创造”并举，确实表现出中国当代学人积极的“筑渠引水”意识。

从中西交流的角度来看，如果说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是彼此可以平等对话的原点，那么，后来之所以出现压倒性的“殖民”状态，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不察。那就是在交流过程中，谁处于积极姿态的“拿来主义”，关系甚大。请注意，当年康熙大帝的声名在欧洲颇为响亮，而中国对于欧洲的了解可以说相形逊色多矣。（参见[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册第286—287页，郑德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这主要取决于交流主体本身。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虽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与产品，但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在输入西学（只是为了邀获中方信任之“技”），而是传播基督福音；但另一个方面，作为异域的主动来者，他们在将中学转入欧洲方面，有着相当程度的自觉意识，同样居功甚伟，欧洲的“中国镜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实现的（要注意，这不在他们的主要职责范围之内）。但他们也有一大失误，即太少将中国经典移译成欧洲语言。（参见鲜于浩等：《近代中法关系史稿》第45页，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就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来客观审视，文化交流乃是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而在交流过程中谁处于积极姿态的主动地位，尤其举足轻重，因为这关涉到交流目标的设定、实施与贯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现代中国的建设进程而言，由传教士到留学生，确实是一关键性的转折点。因为，这意味着接受主体的根本转变。

同样，如果说“西学东渐”早期的发展仍见证了“西学”必须是通过“西人”来进入中国，故此“渐”字确实惟妙惟肖的话。那么，当传教士已